

【哲学研究】

论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批判向度

杨 楹 郭雅玲

摘 要: 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批判方案,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上表征出“批判”的内在本质,从而有别于康德哲学之“批判”、黑格尔哲学之“批判”和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批判”。马克思立足于全面异化的现代生活,通过“描述”而揭露,通过“揭露”而“批判”,通过“批判”而改造,通过改造而实现人的解放、自由与幸福,由此构成马克思生活哲学批判性推进的内在理路,从而展现马克思生活哲学批判向度之“事实性”与“价值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科学性”与“革命性”,以及“现实性”与“未来性”的内在统一,科学地回答了“何谓批判”“如何批判”以及“谁来批判”三个基本问题,由此构成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批判逻辑。

关键词: 马克思生活哲学; 批判; 改造; 描述; 无产阶级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0)06-0104-07

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批判”,非康德“批判哲学”论域中以“明确前提,划清边界”,以达理性自明与确认为内涵和主旨的“批判”,也非黑格尔抽象思辨意义上,将辩证法之批判性内隐于保守性之中的“批判”,更不是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将“批判”停驻于语辞间,进行修辞学意义上的词句“批判”。直言之,马克思是通过“理论批判”而揭示现存的生活世界在本质上即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必须“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而完成对生活世界本身的否定性扬弃与超越。如此,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性”,绝不停留于“批判的武器”,而是必须通过“掌握群众”转换为“武器的批判”,变成“物质力量”,从而粉碎生活世界的枷锁,将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的解放、自由和幸福内置于批判之中,成为彻底批判现实生活世界的价值指向与价值归宿。

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批判向度,在笔者看来,必须明确“批判”的本质内涵、批判的方法论和批判的主体,直言之,“何谓批判”“如何批判”以及“谁来批判”三个基本问题,由此构成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批

判逻辑。

一、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批判”与“改造”

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将“辩证法”以几种虽有联系但不同的方式来加以描述:“它是一种获得知识的态度;它是一种强调了根本的、不可或缺的变化本质的存在观;是一种社会存在观,揭示出社会存在是‘矛盾对立’的统一;它是一种形成概念的方法。”^①不可否认,海尔布隆纳充分剥离与展示了辩证法所承载的多维度空间,但是,他依然将辩证法囿于知识论、认识论等思维和观念领域,将辩证法作为“获得知识的态度”、揭示“存在观”,以及“形成概念的方法”的“手段”,未能关注到辩证法尤其是马克思生活哲学之辩证法所具有的价值维度,这无疑弱化、忽略抑或无视了马克思生活哲学之“辩证法”对生活世界所具有的批判性向度,如此,他所描述的“辩证法”,同以批判和改造现实生活为目标的马克思生活哲学之辩证法,无疑具有本质的区别。

毋庸置疑,马克思生活哲学之批判性,是在承接和超越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尤其是鲍威尔和卢格等

收稿日期: 2020-04-26

作者简介: 杨楹,男,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南宁 530004)。

郭雅玲,女,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南宁 530004)。

人的批判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继承了鲍威尔的批判传统”，“从鲍威尔那里获得了主体性批判的策略”，又“受到卢格的影响改变了批判的目标”。^②但是，马克思改变与重新确立了“批判的目标、批判的主体以及批判的目的”，形成了以“现实生活”为批判对象、以“无产阶级”为批判主体、以“人民的现实幸福”为批判目的的崭新批判方案，实现了批判的历史性转向。对此，马克思说“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在于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③

在此，马克思针对费尔巴哈从“世界被二重化”这一事实出发，以揭露“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为手段，以否定有神宗教、建立爱的宗教为目的，以“异化”逻辑倒置被宗教颠倒了的人与“神”之主宰关系而指证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本质，并指出其不彻底性，就在于“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批判仅停留于对“颠倒的世界意识”的本质揭露，而未能对“颠倒的世界”本身进行批判；未能“从发现神圣家庭的秘密在世俗家庭之后”，强调“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被消灭”。^④一句话，费尔巴哈虽然对宗教展开批判，但是“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如此，这种“批判所能达到的唯一结果，是从宗教史上对基督教做一些说明，而且还是片面的说明”^⑤，“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爱的关系”^⑥，如此，对现实生活未有任何的触动，他的“批判”，本质上仅是脱离现实生活的宗教意识、宗教观念的批判而已。

鉴于此，马克思首先明确其所要批判的对象，已不再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而是“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其批判的目的是为人类追求解放、自由和幸福的“历史服务”，由此确立起新批判的总纲领，标志着马克思开展有别于其他一切批判的生活世界批判。

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批判性，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展现出来，由此构成了马克思的“副本”与“原本”“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双重批判逻辑。

在理论维度，表征为通过“描述”而“揭露”，从“副本”深入到“原本”，体现为理论批判的彻底性；在实践维度，通过对“现象”的批判直抵“本质”的批判，即通过“开火”“炸开”“砸碎”“粉碎”“推翻”“颠覆”“消灭”“代替”等来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改造、改变而表征批判的革命性。如此，马克思生活哲学、生活辩证法的“批判性”，就落实于对现实生活的彻底改造性，由此从“批判”的视角确立起甄别、判断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尺度。这样，则可以说，一切不以“改造”现实生活为目标的批判，都不具有批判的彻底性，都是虚假的批判；同理，一切不以人的解放、自由和幸福为目的的批判，就是不彻底的批判，就是虚假的批判。总之，一切不能服务于现实生活之改造的理论，本质上即是不彻底的理论。这种不彻底的、虚假的批判，在理论上就是以不同的方式对“现存事物”予以“解释”，本质上即是对“现存事物”的历史合法性做永恒性的“辩护”；在实践上，就是对“现存事物”做出原则性的妥协或让步，以“改良”置换“革命”，继续维系着“枷锁”对人的宰制。

马克思强调对生活世界批判的彻底性，在理论上表征为“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⑦。如此，可说，一种体现批判彻底性的理论，其彻底性并非是理论逻辑上的深奥和玄妙，也非理论体系内部的逻辑自洽与圆融，就其要旨而言，乃在于该理论真正反映和彰显了主体的尺度、人的价值主张，真正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根本意愿，体现了人的解放、自由和幸福追求。从这一意义上来看，理论的彻底性，其关键就在于理论主体的人民性、理论主体价值立场的人民性上。而马克思对生活世界批判的彻底性，通过理论的彻底性而锻造出理论的革命性。这便是马克思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解放、幸福理论之事实性与价值性、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而在实践上，就是要“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着自己现实太阳转动”^⑧，就是要“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⑨；要“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⑩，就是“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就是在“搏斗式的批判”中“给敌人以打击”^⑪，就是“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⑫，就是要

“推翻这种存在的东西”^⑬,就是要“消灭私有制”^⑭,就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就是要“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⑮就是“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⑯马克思在不同的语境中所使用的这些充满着批判性、革命性和战斗性的范畴,充分表达了马克思生活哲学、辩证法具有的批判性,落实于具体的生活现实中,即是“改造”,在这一意义上,批判与改造是等值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黑格尔之前,没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敢于如此果断地将哲学置入生活的洪流中。他们都站在岸边,把在洪流之上架起一座永恒的桥梁看做是自己的任务”^⑰。此判断之视野若加以拓展,将马克思的哲学纳入其中再加以判断,则势必会看到,马克思在生活与哲学、生活与辩证法的关系问题上,不仅不同于黑格尔将哲学置入生活的洪流之中,作为密涅瓦黄昏时才起飞的猫头鹰,以绝对理念的否定逻辑,以抽象思辨的辩证法,溶解、吞噬“生活”,成就“作为哲学的哲学”,而且遵循生活第一性的原则,将哲学、辩证法作为批判生活的手段,从而作为新生活的“高卢雄鸡”。如此,马克思将历史生活中的人,包括哲学家,都界定为历史的“剧中人”和“剧作者”双重角色的统一,进而否定以生活旁观者身份出场的任何哲学,实现了哲学、辩证法与生活世界之间的深度统一。这一统一的逻辑就在于“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核心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⑱。如此,马克思将生活世界的改造、无产阶级的解放与哲学的“消灭”统一于现代性生活的场域之中。

阿伦特将马克思作为后黑格尔哲学时代,与克尔恺郭尔和尼采一起,终止柏拉图开启的西方哲学尤其是西方政治思想的传统的人。她认为“传统,作为政治思想的传统从柏拉图开始,止于马克思”,而“传统的终结也带来了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三次飞跃:克尔恺郭尔从怀疑到信仰的飞跃、马克思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尼采的从超感觉领域到感觉的生活的飞跃。这三个飞跃都是自灭的。信仰由于不合理被放弃了;活动因为成了意识形态被废除了;感觉因为成了没有意义的东西被无视了”^⑲。但阿伦特更鲜明地指出“马克思思想的实际冲击力,完全在科学以外的领域,超越了学术的、科学的领域。而

且,严格地说,他的著作中与学术、科学的领域完全不同、非科学的那部分,却扎根于现实”^⑳。

不可否认,马克思的哲学、辩证法的确是扎根于“现实”,扎根于现代社会,与马克思·韦伯一样,“他们所关心的都是某种人类的‘解放’问题”。然而,有别于马克思·韦伯关注“对人类最后的‘尊严’的拯救”,马克思则更“关乎无产阶级的命运”^㉑。如此,卡尔·洛维特进一步认为“马克思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是环绕我们周围的现实性。我们被置入这种现实性之中,并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批判性分析一开始所采取的形式就是以生产过程中人自身的异化为红线而对市民的世界进行批判。对于作为黑格尔主义者的马克思来说,市民—资本主义的世界代表着一种特殊的‘非—理性的’现实性,并且它作为人的世界的那种非人性,是一个对人来说颠倒的世界。”^㉒这一非人性的、颠倒的世界,在马克思看来,本质上即是“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㉓的全面异化。在这个全面异化的世界里,“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㉔。马克思对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生活世界的全面异化特征的揭示,恰如雅克·阿塔利所说“资本主义在异化和剥削劳动者的同时自掘了坟墓。通过使工人被生产出来的物品外化,用金钱刺激他们的狂热,资本主义实现了对工人的异化,由此创造出一个‘幻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被自己消费和生产的商品存在本身所异化。”^㉕

面对全面异化与对立的生活世界,马克思对之予以历史地批判,其目的就是要改造、替代之。对此,马克思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马克思以“联合体”来替代由“对抗”关系构成的“社会有机体”,从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㉖。如此,马克思通过批判、改造资本主义,向人类敞开了一个崭新的生活世界。这个世界恰如雅克·阿塔利所解读的“是一种向着个人自由不断胜利、不断创造的方向一直发展下去、最终

使每个人的全部愿望都能得以实现的‘运动’。……自由和平等将能够和谐共存,这将是一种现实的而非理论的权利平等以及个人自由的平等。”^{②7}

如此,从批判对象视角来看,马克思从早期承续“宗教批判”而转向批判现实生活中的“政治”与“法”,到后来对“意识形态”“异化劳动”“市场经济”“商品”“货币”“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所进行的全面批判,正是马克思所强调的要揭露“非神圣形象自我异化”的历史展开,由此构成马克思生活哲学批判的理论图景。

当然,“批判”若只停留于“理论”层面,囿于“观念领域”,未将“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未能从“理论批判”落实为“实践批判”,一句话,未将“批判”落实为具体的改造,则是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从这一意义上来讲,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批判”,即是“改造”为归宿和价值目的,实现“哲学”与“生活”的历史性互动与互生。

二、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批判”“揭露”与“描述”

针对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试图将马克思定位为资本主义病榻旁的大夫,歪曲、否定马克思生活哲学、辩证法的彻底批判性,我们必须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生活哲学和辩证法深刻的批判性内涵,张扬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批判精神。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批判”的真正内涵予以明确地表达。他说“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它不是解剖刀,它是武器。它的对象是自己的敌人,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②8}马克思在此强调了批判“不是解剖刀”,而是“武器”,批判的目的不是“要驳倒”,而是“要消灭敌人”,这就充分凸显了马克思的“批判”是突破观念领域、以改造现实生活为其价值指归的实践路线。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②9}。由此,他指出,研究和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③0}。这再次表明,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形

式和生产方式时,超越了实证主义的认知原则和庸俗经济学的价值立场,将“事实性”与“价值性”、“科学性”与“真理性”统一于对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生活世界的“批判”之中。

马克思指出“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③1}但是,如何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予以揭露呢?马克思提出了其独特的方法“描述”。由此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由“描述”而展开的“揭露”,以“揭露”而进行“批判”的推进逻辑“描述”→“揭露”→“批判”。

在对德国制度进行批判时,马克思正是以“描述”而揭露德国的现实境况的。他说“批判的主要工作是揭露”,“这是指描述各个社会领域相互施加的无形压力,描述普遍无所事事的沉闷情绪,描述既表现为自大又表现为自卑的狭隘性,而且要在政府制度的范围内加以描述”,以及“应当把德国社会的每个领域作为德国社会的羞耻部分加以描述”,以使“不让德国人有一时片刻去自欺欺人和俯首听命。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公开耻辱,从而使耻辱更加耻辱”。^{③2}

马克思以“描述”对生活世界的真实“景象”予以揭露,根本上即是透过生活之复杂的现象,让生活现实之真实予以敞开而使之内在本质得以呈现,如此,则可以说,马克思对生活世界予以批判和揭露所采用的方法论,就是超越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生活现象学”。

马克思的“生活现象学”,通过“描述”,首先彰显马克思的批判、揭露所遵循的“唯物主义”客观性原则,进而在“客观性”原则之基础上,揭示“现存事物”之命运,厘清现实生活通过批判所具有的“未来性”特征。这样,“描述”在遵循客观性的基础上,将生活世界的“实然性”与“应然性”统一起来。由此,“描述”为客观真实、全面准确、深刻系统地认识现实,进而批判和改造现实,提供了方法论的保证。

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确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进步性和历史合法性,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内在矛盾、经济危机及其被替代的历史必然性,揭露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剥削程度,掌握无产阶级的成长、成熟及其革命状况,可以说都充分遵循了生活现象学的方法论,很好地

运用“描述”的方法,把握历史“现象”,进而解蔽“现象”,发现其隐藏于现象中的秘密,创造性地建构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理论体系。

譬如,《资本论》开篇就直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③在此,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点的整体性与抽象性,以最直观的社会财富“现象”,即“庞大的商品堆积”呈现于世,于此,马克思化内在本质为外在现象、化抽象规定性为具体实在性、化生产事实为生活事实、化“现实”为“现存”,如此,从这一最常见、最普遍存在的现象——“商品”入手,即是从“描述”与生活具有直接相关性的“事实”入手,径直达到对“商品拜物教及其秘密”的解构。

同样,通过对“交换过程”从简单的“物物交换”到“一般等价物”,再到“货币”出现的历史过程的“描述”,揭示了“货币”的产生与本质,揭露了“拜金主义”之拜物教实质。

通过对“货币”转换为“资本”的过程的“描述”,对“资本原始积累”历程和大量事实的“描述”,对“资本分化与运行过程”的“描述”,揭示了“资本”的本质和“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揭露了资本宰制“人”的历史境遇。

通过对工厂法的规定、对工人实际生产状况的“描述”:“按照工厂法的定义,延长工作时间就是迫使未成年者每天工作的时数超过法律所允许的时数。这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或者在早晨 6 点钟以前开工,或者在下午 6 点还不收工,或者缩短工人法定的用餐时间。在一天中,蒸汽机开动 3 次,即在早晨开工时,以及在早饭和午饭复工时;这样,就有 6 次可以偷去 5 分钟的机会,一天总共可以偷去半个小时。每天延长 5 分钟的工作,一周一周积累起来,一年就是两天半,但是延长工作时间的骗人伎俩远远超过了这个范围。”^④并且通过“工厂视察员的报告毋庸争辩地证明了:英国工厂制度中的卑劣现象正随着这个制度的增长而增长。为了抑制工厂主的残酷贪欲而制定的法律不过是骗人的东西,因为这些法律的措辞就使它们本身的规定完全归于无效,并且使负责执行它们的人无能为力;工厂主和工人之间的对立在迅速接近那种爆发真正社会战争的限度”^⑤。马克思揭露资本家对工人残酷剥削和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对立的客观事实,从而批判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生产的非人性。

如此,马克思一贯遵循在其“生活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中,马克思更通过对大量事实的“描述”,来揭露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与危机,将早期思想中锐利的批判锋芒与刚毅的批判风格,化为对现实与历史更朴实、更朴素的描述,从而让被“描述的事实”,释放出对“生活世界”的解释力与批判力。

马克思始终坚持“实践的思维”原则,通过“描述”的方法,解除与终止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之神秘性与空洞性,彰显了马克思生活哲学以“描述”为方法和手段,从而保证其对生活世界的批判超越修辞学话语而具有真切的“实证性”,充分表征出马克思生活哲学批判的生活、实践路向。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说道“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他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⑥在此,须深切地注意马克思强调“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和“对现实的描述”作为自身哲学把握生活及其历史的独特方法,获得其“真正的知识”,生成其“真正的实证科学”,从而超越“思辨哲学”。

马克思的“生活现象学”方法,尤其是以揭露现象、事实之真的“描述”方法与手段,以其对“现象”描述之事实性、客观性和现实性,保证了解蔽、揭露“现象”之本质的可靠性、可检验性和有效性,从而确证与支撑了马克思生活哲学批判的合理性、合法性与正当性。

如此,“批判”→“揭露”→“描述”,体现了马克思“生活现象学”的方法论,从原则到具体方法的推进与落实,基于此,“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方法论原则在马克思生活哲学中得以高度的统一。

三、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批判”与“批判者”

在马克思生活哲学的语境中,批判从来都是批判者的批判,是批判者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展开的批判,是从“批判的武器”推进到“武器的批判”,最终指向现实生活的批判,是通过“批判的武器”掌握群众而实际地改变现存事物的批判。简言之,马

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批判,最终通过“批判者”而将批判实践化、现实化和生活化,从而彰显马克思生活哲学之批判最终必须落实于现实生活之改造的本质内涵。

不可否认,空想社会主义者从私有制、人性、道德等诸多维度和层面对资本主义之“恶”予以了揭露与批判,他们“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例如消灭城乡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所有这些主张都只是表明要消灭阶级对立”,但是,“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⑦,因此马克思把他们称之为“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之“空想”,不仅在于“这些发明家”“不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以幻想的条件”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而且在更根本的意义上,“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因此,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要由一种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⑧,一句话,在他们未来社会主义的设计中,未能确立真正的历史与生活的“批判者”,在他们的批判理论中,现实生活的真正“批判者”,无疑是缺位的。

马克思说“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⑨这个命题中的“被动”二字,马克思以“黑体”加以突出,且说“革命”需要这个“被动因素”,那么这个“被动”“被动因素”到底指的是什么?

在鲍威尔看来,“群众”“无产阶级”只会注重物质利益因而没有改变历史的“自我意识”,不能成为创造历史的主体,因此认为“群众”“无产阶级”在历史中、在革命中只是“被动的”因素;而改变历史现实的希望只能寄托于他们这些高明的批判家、“自由人”身上。正是基于此,鲍威尔猛烈攻击共产主义,因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正是把政治和社会的希望都寄托于“群众”“无产阶级”身上。

对于鲍威尔等人无视、蔑视“无产阶级”“群众”的历史主体性,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布鲁诺先生所发现的‘精神’与‘群众’的关系,事实上不过是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的、漫画式的完成,而黑格尔的历史观又不过是关于精神和物质、上帝和世界相对立

的基督教德意志教条的思维表现。在历史的范围内,在人类本身的范围内,这种对立表现为:代表积极精神的少数杰出人物与代表精神空虚的群众、代表物质的人类其余部分相对立。”^⑩“‘批判’认为自己并不是通过群众体现出来,而仅仅是通过一小撮杰出人物即鲍威尔先生及其门徒体现出来的……一方面群众,他们是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历史因素……”^⑪

马克思通过批判鲍威尔认为“群众”“无产阶级”没有“自我意识”,只具有“被动性”特质,不能成为历史创造主体,进而贬低、否认“群众”“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之错误观点,强调指出“群众”“无产阶级”恰是“革命”不可或缺的、积极的因素,是历史活动的主体。这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与鲍威尔关于“群众”“无产阶级”在“革命”即历史创造活动中的地位、作用等的不同立场、认知和判断,而且标示着马克思与鲍威尔“无产阶级观”“群众观”的根本分野,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确立了“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历史创造主体论,在更深层次上,解除了鲍威尔及一切空想主义者所主张的“拯救论”和“精英论”,提出了“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自我解放理论。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从根本上找到、确认了现存事物的批判者“无产阶级”。

正因为马克思确认了“无产阶级”作为现实生活的批判主体,“批判的武器”、科学的“理论”才能通过“说服”而“掌握群众”,也才能转化为“武器的批判”,成为改变现实生活的物质力量。如此,马克思生活哲学批判的彻底性,通过批判者的批判活动,才落实与体现为对现实生活的改造。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说“工人们组织这些团体,就表明他们非常彻底而广泛地理解从他们的合作中所产生的那种‘巨大的’、‘不可比拟的’力量。但是这些群众的共产主义的工人,例如在曼彻斯特和里昂的工场中做工的人,并不认为用‘纯粹的思维’即单靠一些议论就可以摆脱自己的主人和自己实际上所处的屈辱地位。他们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远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的、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生活中真正成为人。”^⑫

